

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
出版规划项目

米晓蓉
刘卫平
主编

陕甘宁边区 大生产运动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
出版规划项目

米晓蓉 刘卫平 主编

陕甘宁边区 大生产运动

红色延安
口述·历史
HONGSE YAN'AN
KOU SHU · LISHI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

图书代号 SK14NO22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 / 米晓蓉, 刘卫平主编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 4
(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)
ISBN 978-7-5613-5220-5

I. ①陕… II. ①米… ②刘… III. ①大生产运动—史料 IV. ①K269.5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6121 号

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

米晓蓉 刘卫平 主编

责任编辑	巩亚男
责任校对	杨珂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	www.snupg.com
印 刷	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 × 1020mm 1/16
印 张	18.25
插 页	2
字 数	215 千
版 次	2014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13-5220-5
定 价	38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电话:(029)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(029)85303879

“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”

编辑委员会

总 策 划	冯晓立	傅功振		
主 编	任 文			
编 委	薛义忠	石 杰	梁向阳	孙国林
	朱鸿召	张军锋	梁星亮	姬乃军
	刘卫平	田 刚	陈答才	王晓荣
	刘东风	冯晓立	傅功振	
参编人员	王 耀	王晓飞	王慧子	邓 微
	仝 蕾	巩亚男	庄婧卿	刘存龙
	张 双	赵虹波	雷亚妮	

编辑说明

“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”是一套以口述实录、回忆录、访谈录以及相关原始档案并配以历史图片为基本内容的史料集成。它试图以亲历者、当事人、知情者或者后代的讲述、回忆，来还原历史真相，呈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，从而改善当代人对“符号化”延安的僵化认识，再现一个本色、真实的延安。入选文章均来自已出版的图书、杂志、报纸，酌量选录地方党史办公室、政协文史机构等征研的资料。

丛书所选文章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，尤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。丛书内容虽以回忆、口述等形式呈现，但其较强的故事性、可读性，有益于对当代读者，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，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。

丛书共17种21册。内容包括口述实录、回忆录、访谈录、重要的档案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章。口述实录、访谈录与回忆录前均设置了对口述人或回忆人的简要介绍，并突出介绍口述人或回忆人在延安的工作或生活经历。

所选文章中，因个人当时的见闻条件、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以及可能附加的主观因素等，讲述人或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，且不同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细节叙述也常稍有出入，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

性、多元性，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应该是“人的历史”，不能只有一种“写法”或“说法”，更不存在“唯一性”，这样才能更趋历史“真相”。为尊重原作，编者收入时未强求统一，多以“编者注”提醒读者注意。

入选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，每篇文章自有其文字风格和时代的语言习惯，收入本丛书时，除特殊情况外，皆尊重原文，不做改动；原书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术语）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，多未做改动。如确系作者笔误、排印错误、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，则予以修正。标点符号、数字用法等，依据现有出版规范做了统一处理。除特殊情况外，原文篇后注或行文注统一移作脚注，文献著录稍加统一。

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，或翻检资料有限，或水平、认识有限，其中可能存在讹误或差错，敬请方家、读者批评指正。

作为一套大型汇编丛书，涉及文字与图片等著作权联系方面的工作难度很大，我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联系，但仍有部分作者信息不明或原工作、生活地址变动而无法联系，希望版权人或版权继承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，以奉稿酬与样书。

谨以“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”的出版，向革命先辈致敬！

“红色延安口述·历史”编委会

2014年3月

前 言

延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为了生存和发展，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。生产运动首先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展开。从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，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，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历时长达八年。在这八年中，边区的党政机关、部队、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，逐步达到粮食、经费自给、半自给或部分自给。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，兼办工业、手工业、运输业、畜牧业和商业。通过实行公私兼顾、军民兼顾，组织劳动互助，发展边区经济，在党政机关、部队、学校、工农群众的共同努力下，陕甘宁边区终于克服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，为巩固民主政治，支持敌后长期战争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，奠定了物质基础，壮大了革命力量，并对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。

一、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

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的基本精神，确定了“休养民力”，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的政策，提出边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：发展国防生产，充实抗战力量，供给战争，改善人民生活，团结广大民众，推进民主政治，参加战时生产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。边区政府成立之初的1937年至1940年，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。外援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，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。四年间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的比例依次为77.2%、

51.69%、85.79%和70.54%。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：一个是征粮，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，中农负担很轻，贫农全无负担；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。然而，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。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，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，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国民党也开始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。1939年1月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“溶共、防共、限共”的方针后，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，这一年，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近31万人。

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，1939年至1940年，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。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，使边区的面积由129 608平方公里减少为98 960平方公里，人口由200万减少为约150万。1940年蒋介石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（最多时总兵力达50万人），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，形成西起宁夏，南沿泾水，北接长城，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（北边两道，南边三道）。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，严密监控，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，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。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；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，特别是棉花、布匹、粮食、药品、火柴、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，违者以“走私”论罪，物资没收，货主法办。国民党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，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，引诱走私，扰乱金融市场，破坏边区财政。1941年10月，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军饷（每月60万元），同时实行断邮，其他外援也无法汇兑，整个外援一下子全部断绝，边区的财政困难迅速降临。

尽管财政遇到严重困难，但边区的负担仍然猛增，支出大幅增加。国民党统治区许多人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来到边区；各解放区的干部也陆续来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；为了保卫边区，中共中央不得不陆续从前方调回一批部队，边区的军队人数也增加了一万多人。这样，就使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大量增加。1937年仅14 000余人，1938年16 000余人，1939年猛增到49 686人，

1940年又增到61 144人，1941年则高达73 117人。再加上8 120匹马的草料，边区的财政就更不堪重负了。当时边区实有人口为1 362 254人，脱产人员比例占边区总人口的5.37%。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不得不以增加人民的负担为代价来开辟财源。而1940年到1942年，边区又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40年受灾面积4 298 312亩，损失粮食235 850石（每石300斤），受灾人口515 145人；1941年，受灾面积603 558亩，损失粮食47 035石，受灾人口90 470人；1942年，受灾面积856 185亩，损失粮食79 720石，受灾人口352 922人。尤其以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，致使当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，群众生活艰难至极，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。1941年，边区财政亏空567万余元。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。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说：“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，没有油吃，没有纸，没有菜，战士没有鞋袜，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。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，企图把我们困死，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。”^①

在这样一种客观形势下，革命需要生产，生产就是革命，大生产已是边区军民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，已经成为关乎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环节。

二、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指导方针

对这种局面的出现，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。抗战刚转入相持阶段时，毛泽东就意识到：“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，将是财政经济问题，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，也是八路军的困难，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。”^②1938年秋，由于给养不足，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，从事农副业生产，种菜、养猪、打柴、做鞋等，从而改善了部队生活。毛泽东对这一做法予

^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892页。

^② 毛泽东1939年1月2日为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创刊撰写的发刊词，载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1939年1月创刊号。

以肯定，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。1938年12月8日，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作报告时说：“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，饭不好但有小米饭，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、没有饭吃，那该怎么办？无非三种办法，第一饿死；第二解散；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，就得要生产。我们来一个动员，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，自己弄饭吃，自己搞衣服穿，衣、食、住、行统统由自己解决，我看有这种可能。”^①1939年，边区正式提出生产自给的任务。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，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，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“发展生产，自力更生”的口号，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、机关、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大会作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，在讲到边区政府的任务时说：“为要支持长期抗战，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，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，改善人民生活，以加强抗战力量，扩大生产运动，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。”^②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”，交付边区政府实行。1月25日，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并讲话。他说：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，意义是很大的。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，是需要多方面的努力，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，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，要衣穿，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。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已有了一些成绩，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。前方努力打仗，后方努力生产，打下去，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。在我们边区，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，其他如学校、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。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，决定成立以林伯渠为主任是总生产运动委员会，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。2月2日，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，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《加紧生产，坚持抗战》的动员报告，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，提出了发展生产

^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毛泽东年谱：一九三—一九四九》中卷，人民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99页。

^② 陕西省档案馆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：《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》第一辑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49—150页。

的具体计划，号召全体军民，努力生产，克服困难。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明等中央领导出席大会并演讲。毛泽东指出：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，意义是很大的。要继续抗战，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。陕甘宁边区有 200 万居民，还有 4 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，要解决这 204 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，就要进行生产运动。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，他说：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，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，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。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，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，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。所以无论部队机关，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，大家种菜喂猪，办合作社，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。^①

1939 年 2 月 4 日，陕甘宁边区党委、边区政府、边区抗敌会、保安司令部联合发出《关于发展生产运动的紧急通知》，要求各机关、部队及全边区人民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，本年增开荒地 60 万亩，以达到生产自给的目的。同时要求各县组织生产委员会，具体领导生产运动。2 月 10 日，作为生产运动指导机关的陕甘宁边区总生产委员会成立。为奖励干部和人民努力完成生产指标，边区政府还颁发了《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》《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》《机关、部队、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》，同时派出巡视员下去督导帮助。6 月 10 日，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：“吃饭是第一个问题”，要“自力更生克服困难”。号召“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，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、部队、学校的农业、工业、合作社运动，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、穿衣、住屋、用品问题全部或一部，克服经济困难，以利抗日战争”。^② 12 月，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《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》，号召边区人民“继续发展边区经济，使边区全体人民足衣足食，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”。边区党和

① 转引自刘益涛编：《毛泽东在延安纪事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，第 95—97 页。

② 中央档案馆编：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》第十二册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，第 118 页。

政府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，明确提出“自给自足”的奋斗目标。

1940年2月10日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发出《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》，要求各部队“一面战斗，一面生产，一面学习”。至此，大生产运动全面展开。为了节约开支，6月18日，边区政府秘书处及边区各厅处还成立了节省委员会。

1939年至1940年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初步发展阶段。这期间，边区有一定的外援，党内外普遍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思想，因此，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成效和影响并不大。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。首先是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。1939年和1940年，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，粮食产量和牛、驴、羊数量都有较大增长。1940年，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，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。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，从中央和边区领导人到勤务员和青年学生，全体动员上山种地。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，边区的工业建设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。

到1940年秋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这时，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，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，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。与此同时，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、病、水、雹、风五大灾害的侵袭，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。边区的财政经济严重恶化，经济进入极端困难时期。前一阶段小规模的生产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，只有开展大规模生产自给运动，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，才能解决军需民用的问题。肖劲光回忆：“一天，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、高岗和我找去，对我们说：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？是干革命的。现在日本帝国主义、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、饿死我们，怎么办？我看有三个办法：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，那就不革命了，大家解散回家。第二是不愿解散，又无办法，大家等着饿死。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，自力更生，发展生产，大家共同克服困难。他的这段话，既风趣，又易懂，像一盏明灯，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。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：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。毛泽东同志听了，笑笑，接着说：现在看来，也只有这个办法。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，是打破封锁、

① 肖劲光：《肖劲光回忆录》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98—299页。

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。”^①

1940年11月，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了《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》，指出：“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，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”，“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经济建设作为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之一”。1941年12月，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《关于1942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》，再次明确指出：“目前边区经济财政还处在一个达到自给自足的过渡阶段，困难还远未完全克服，战争与革命环境的持久与日益发展着的艰巨斗争，百倍地要求我们党要加强经济财政建设工作，并应确定经济财政建设为边区党最中心的任务之一。”^①1942年10月，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召开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指出：“在目前情况下，发展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。”这次会议确定：“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，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，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。”

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具体领导下，边区的军民和党政干部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，边区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。1941年各部队和各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，各机关经费的自给部分达70%。1942年中央各机关自给48%，边区保安处自给70%，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给32%。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，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。

1943年以后，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即实现丰衣足食、建设革命家业的阶段。1943年1月8日，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，李富春在会上作了《丰衣足食，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》的报告，提出了1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。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向边区人民提出了“耕三余一”号召。

在领导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，毛泽东先后发表了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》《开展根据地的减租、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》以及《组织起来》等著作，提出了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。毛泽

^①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：《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·第三编·工业交通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7页。

东提出的这个总方针，正确地反映了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的关系，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，也就是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，纠正了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、开辟财源，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做法。这个总方针要求从实际出发，发动和组织军队、机关、学校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，开展生产运动，在着重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，大力发展公营经济，以求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，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质需要。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边区经济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，既反映了大生产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，也保证了大生产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。

为了把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这一总方针落实到实际工作中，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坚决实行“以农业为第一”的方针。明确要求，除集体进行开荒、种粮、种菜之外，还要组织专门人员创办农场、牧场、菜园或者和农民伙种粮食、蔬菜，养猪、养羊，以便增加粮食、蔬菜、食油和肉类，逐步实现粮、菜、油、肉的半自给或自给。为此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：第一，制定优待移民、难民的政策，鼓励他们开荒生产；第二，开展减租减息，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；第三，倡导劳动竞赛，表彰劳动模范。

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“组织起来”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。为了正确处理公营经济内部军队、政府、机关、学校等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，正确处理各部门中的上级和下级、集中和分散、这一单位和那一单位之间的关系问题，充分调动各部门、各单位发展经济的积极性，保证生产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，中共中央提出了“统一领导，分散经营”的方针。为了大力发展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，正确处理公私之间、军民之间、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，中共中央制定了“公私兼顾”或“军民兼顾”的政策。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，在处理生产和消费关系问题上，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实行生产和节约并重的方针。

这些方针政策，正确地解决了发展生产和抗日战争的关系，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关系，农业和工业、商业的关系，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的关系，革命全局的利益与集团利益、个人利益的关系；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，保证了

边区大生产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。

三、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

“这时的边区，日夜都有动人的景象。黎明时分，东方刚刚露出一一点鱼肚白，成群结队的人们，已荷锄扛耩上山了。登高一望，到处是挥汗如雨的垦荒者。山坡上，沟道里，红旗招展，耩锄飞舞；歌声、笑声、口号声、加油声此起彼伏，引得群山共鸣，飘向远方。夜晚，沸腾的群山安静了下来，一孔孔窑洞的灯火却亮了起来，万家灯火与点点繁星交相辉映。‘白天生产，夜晚工作’，几乎成了所有机关单位的常规；紧张、忙碌，是边区各部门的共同作风。”这是《陕甘宁边区政府史话》中的一段文字，生动反映了大生产运动紧张、忙碌、热烈的情景。

大生产运动伊始，毛泽东就号召机关、部队、学校“一面工作，一面学习，一面生产”。张闻天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做“劳动的先锋”。李富春提出了机关、部队、学校生产的种类“以农业生产为主，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”的原则。边区的机关、部队、工厂、学校、农村各界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号召，积极投身到火热的大生产运动。机关、部队、学校的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。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、准备自给的阶段。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、争取自给的阶段。从1943年开始，是实现丰衣足食、建设革命家业的阶段。

1941年和1942年，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迫使机关、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，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，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。为此，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，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，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、后勤经济处、边区财经处等，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。同时，机关、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，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主，转到以工商业为主。经过了艰难的探索历程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。1941年，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，收获各种蔬菜87.9万斤，做到自给

蔬菜4个月。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，收获各种蔬菜71.5万斤，自给5个月。中共边区中央局140人，种菜收获2.8万斤，自给9个月。1942年，中直、军直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%。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、财政、建设、教育四厅合办两个农场，共收入约25万元。中央各机关学校，配备种菜人员40名，在388亩川地、1941亩山地上种菜，收获各种蔬菜74.5万斤，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。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在600万元以上。此外，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。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，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，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一斤肉，全年约值35万元。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，1942年1月至10月止，平均每月养猪265头，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秤的猪肉，合边钞70万元。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，照此计算，总价值当在400万元以上。边区机关、学校的工作人员依靠自己动手、艰苦奋斗，在工商业经营上取得了显著成绩，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，1942年约达5000万元。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，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，还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。

在“丰衣”方面，除中央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，各机关、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，多发一条手巾，多补充一套衬衣；办不到的，至少要补充一件背心，一条短裤，同时靠个人劳动，每人自己要织一件毛衣以至一条毛裤。在“足食”方面，主要是改善伙食，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.5斤肉外，各机关、学校自己要解决1.5斤肉，保证每人每天一斤蔬菜、6钱到7钱油。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、勤杂人员必需的学习用具，建立俱乐部。生产劳动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予表扬、奖励，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。中共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负责人带头开荒生产，交公粮。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下面的山沟里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，种上蔬菜，一有空就去浇水、拔草。朱德背起了粪筐，周恩来、任弼时摇起了纺车，林伯渠公布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。他们的模范行动，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，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、克服困难的信心。

军队是除农民以外数量最大、最有组织的劳动集团。毛泽东指出：“我们有打仗的军队，又有劳动的军队。打仗的军队，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，一方面打仗，一方面生产。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，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，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，那么，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。”^①

军队的大生产运动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最为闻名，被誉为“发展经济的前锋”，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。1939年10月，为了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，保卫中共中央，保卫边区，中央军委把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从晋西北前线调回陕北。1940年5月，朱德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，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，实行屯田军垦的政策，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，密切军民关系，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，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”。为此，朱德亲自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。1941年3月至1942年，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，先后分四批全部开进南泥湾。这片多少年来荒无人烟、杂草丛生的“烂泥湾”，顿时人声鼎沸、战歌嘹亮。第三五九旅的将士们，身背钢枪，手握镢头，用生命和鲜血，把一个“只见梢林不见天”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稻田翻绿浪、窑洞满山腰的“陕北好江南”。1941年，开荒1.12万亩，产粮1200石，粮食自给1个月，蔬菜完全自给，经费自给78%。1942年，开荒2.68万亩，产粮3050石，粮食自给3个月，经费自给92%。1943年，开荒10万亩，实现了“不要政府一粒米，一寸布，一文钱”的奋斗目标，做到了粮食、被服、经费、肉、菜的全部自给。1944年，全旅种地达26万多亩，收获细粮3.6万石，缴纳公粮1万石，实现了每人生产六石一斗细粮，一人一只羊，两人一头猪，十人一头牛的计划，达到了“耕一余一”。此外，第三五九旅还开展了多种经营，办起了伐木厂、造纸厂、被服厂、豆腐坊等，成立运输队和军人合作社。军人家属也不甘落后。四支队供给处处长吴成恩的女儿吴萍虽然只有7岁，却学会了纺线，而且每天能纺一两头等纱。第七一七团

^① 毛泽东：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928页。